Co-China 周刊

NO. 184
2014年 12月19日

罗永生：「后占领」时代的绝望战斗｜胡慕情：白是最危险的颜色｜
周濂：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

「后」时代的力量



编者的话

随着占领区全面清场，香港雨伞运动告一段落，进入“后占领”时代。而在台湾，甫胜选的柯文哲因拜会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忽视公民团体的建言而引起一些支持者不安。白色，从最纯洁的第三种力量，迅速变成值得警惕的新信号。

两地的境况都象征着一个“后”时代。催泪弹下的愤怒、胜选当夜的狂欢，都已成历史。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路上，毕其功于一役永远是徒劳的想象。人们必须学习如何克服内心的无力感，来面对情绪消弥后更漫长的日常。

本期 Co-China 周刊从港、台两地出发，梳理不同境遇下如何摆脱悲情和不信任，保持警觉与敏感。罗永生的文章指出，雨伞运动是无法被定义为“失败”的。清场是另一种开始，接下来要做的是与香港习以为常的犬儒主义主导状态做最持久的抗争。许宝强回顾运动中的学习互动，提醒人们毋忘初衷，避免自我否定走进歧路。何韵诗反思自己和周围人七十多天来的变化，鼓励人们在这样的间歇、空档时期沉淀、思考、消化，学习掌握空白。

胡慕情和黄哲斌，分别对柯文哲胜选后走的路线露出与权贵无异的端倪表示担忧：“万一不幸如此，真正的公民力量或第三势力将益发重要，草根公民团体若能活泼诚恳积极，承接这股期待落空的民气，让政治力与社会力真正接轨，台湾民主才不致走向黑暗荒原，走向漫漫长夜。”

面对压抑的大环境，每个个体都需要精神资源给养，才有力量摆脱虚无、犬儒。陈子明近乎克里斯玛型的人格气质，对世界的要求与责任；周保松择善而固执，在政治哲学中寻找正义、公平的道德基础；周濂对正直生活的朴素坚持；骆以军对人性美好的本能相信......这是他们面对自我与世界的信仰基础，也是其他人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的暖意和光亮。

目录













【判】

罗永生：「后占领」时代的绝望战斗


罗永生：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 **占领运动随着清场不得不终结，社会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担心的倒不是政权秋后算账、白色恐怖，而是回复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义主导的状态，以激进包装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潜能、新尝试。**

星期四晚 10 点，夏悫道上灯光昏黄，车辆飞驰，行人绝迹。同一路段，在一个小时之前，却还是旌旗飘扬，人声鼎沸，慷慨激昂。香港既有的城市秩序快速的修复，使一场震惊世界，持续了 75 日的占领运动，戛然终结，恍如一场黄粱之梦。

可是，没有人以为这场运动真的会因此而告终。如果林郑都不相信，哪会有街头上真正关心政治的人相信？可是，金钟清场将临前后，一些评论人已急不及待去作总结陈辞。但既然运动尚未结束，又如何能急不及待去评论成败？又如何能逼着去叫人「今次一定要『敢于』承认失败」？

从某个意义来说，今次占领运动根本就没有可能成功，也没有可能失败，因为 928 突然涌现在金钟、旺角、和铜锣湾的群众，根本从来没有共同达成什么运动的协议，以什么为目标。有人原来出来支持罢课学生，有人抗议警察施放催泪瓦斯，有人要高喊打倒共产党，有人要去占领区发表政见演说，示范勇武……这些诉求和目的，有的达成了，有些过时失效了，有些根本不可能短期实现。



70 多天以来，没有组织，没有大会，学联不代表我，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号响彻云霄，给某些人大肆褒扬的正是运动中的「自发主义」。而既然原则是自发主义的群众抗争，也就根本从未有人可以代替其他任何人去树立任何运动是否成功的标准。

在街头我们有时会共同喊相同的口号；学联那次去谈判，也提过一系列诉求，但政府从未给予实质的响应，因此尚未成功。可是，那些今日急着要把运动定性为失败了的失败主义者，又有多少曾经授权学联去代表他？……在一个「谁也不代表谁」的大气候底下，究竟又有谁可以代表谁去宣布运动已经失败？

「工具性」 vs .「表达性」

社会学家研究社会运动的文献，将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分别归类为「工具性」和「表达性」的两种不同取向。工具性的社会运动以争取具体可见成果为目的，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各种资源去达成目的。可是，表达性的集体行为根本不会以达成短期可见目的为重点，因为愤怒、抑郁、疏离，以致无力感的宣泄、爆发，根本就无法用一些具体、短期的工具性诉求可以承载。这些集体行动的参与者，志在从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让情绪可以表达，更透过找寻分享共同价值的其他同志，使彼此可以互相扶持，达成更紧密的团结与认同。

如果说，争取加薪、改善待遇的经济性罢工，是一种工具性社会运动，那么参加胡士托音乐节，表达反战愿望、抗议资本主义的异化生活方式，就不可能用工具性诉求是否成功达到来评价。

香港的占领运动源于政改，目标是争取真普选。当初三子发起的「和平占中运动」，原来的构想是藉「电子全民公投」及声称要发动的「占领中环」，意图为政改的谈判角力增加筹码。以这目标来组织的占中运动，显然是工具性的。可是，从公投和拟定占领日期的先后次序，根本就没有预计过有 831 的人大落闸，所以整个和平占中，根本没有任何「后占中」或者「占中难产」后的应变计划。所以，他们也从没有设计过一个以「迫使人大撤回决定」为目标的占领运动。

也因此，从 831 开始，占中运动已经应该宣告失败。而支持学生罢课的群众，927 当晚闻三子宣布提前启动占中而大量离开，亦证明了原来占中运动已经失去时效。三子在 928 未



发生占领夏悫道的事件之前，既没有宣告占中行动的细节，也没有说明行动的步骤，而只是枯坐添美道大台等候被捕，迎接公民抗命这「被捕」的「人生最美好时刻」（原话）。这亦证明了他们心目中的「占中」已经结束，准备在「成功地被捕」的一刻迎接「失败」。你能说它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谁有权宣布运动失败？

当然，占中原来计划大失预算，不代表市民默认失败。928 的群众用自己的智慧诠释占领，自发堵路，打破人大落闸我们只能无奈接受的悲观主义，认命主义和失败主义，而是试图突围而出，在金钟、旺角、铜锣湾引爆了可歌可泣的占领运动。试问：没有当时的市民群众和学生，不甘失败主义，不以三子原计划失败为市民失败的自发、不认命精神，又何能提振士气，让运动有起死回生的契机？

而如果占领运动从催泪弹爆发的一刻开始，已经是由自发、不认命精神所启动，那今天谁又有权来宣布，运动已经失败？

当然，占中三子计划的和平占中并没有成功，而学联在与林郑会谈后提出的延续谈判条件，也未能实现，取得胜利。然而，这些短期的工具性目标，又岂能涵盖整个以自发性为主导精神，以表达性宣泄为主轴，以创新性探索为重心的雨伞运动？

归根到底，当日在金钟街头捱催泪弹的群众，又或者留守了在各区 70 多日的群众，又有多少真的如此乐观，相信人大是会因为他们的留守而退让？很显然，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绝地反抗，重视运动过程所召唤出的新的社群感、团结感、战斗意志，以至对香港社会生活深刻的批判、反思，重拾追求理想的社会生活的那股乌托邦式冲动，才是大雨伞旗下 70 多日无法用短期目标去评估的成果。对于这种自发主义精神的草根性、坚韧性，谁又敢言这种自发主义创新都已经失败？

事情不是因为它有希望，而是因为它正确，所以才值得做。因此之故，如果有人要声称运动失败了，他首先要提出的证据不能单止是政府没有作出让步，而更要说明，运动中一直主导的自发、不认命精神，运动中的自发主义路线，是否也一并失败。



可是，自发主义的群众抗争失败了吗？先莫说方兴未艾，晚晚出发的旺角鸠呜团，以及区区可见、自发挂起的黄色标语，以及大大小小的落区计划、雨伞大学，以至酝酿中的新青年政党，参选联盟等……这些「后占领」的运动能量积累，急速转化，一些在播种，一些在发芽，但远远未到评估成功失败的时候。

1968 年 3 月，巴黎农泰尔文学院学生因为宿舍生活的管制问题，占领校园。风波不断蔓延，波及巴黎大学。5 月学生发动大示威，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街垒战。外省也发生骚动，工人发动全国罢工，要求戴高乐总统下台。全法国陷于瘫痪。是为法国五月风暴。可是 5 月底戴高乐绝地反击，发动百万人参加反示威，支持政府。解散国会，右派大获全胜。这场举世闻名的风暴，成败也难一言定论。

从政治上说，运动使左派大败，右派大胜。可是，西方的文化思潮和继后的新社会运动，以至往后几十年社会改革的思维和方案，无一不受益于五月风暴的遗产和经验教训。青年激进主义，也影响全球，改写世界历史。那么 1968 年的五月风暴，究竟是一个成功的还是一个失败的社会运动呢？

最大共同敌人：犬儒主义

香港的社会运动，如同政治民主运动，长期受制于「虚拟自由主义」的谨小慎微作风，亦受单一议题社运的范式所局限，把社会行动、抗争都化为争取小范围政策修改的工具组织。这种运动传统，动员可见但有限的资源，只有战术的考虑，而无战略的反思和探讨。妄以短期成败论英雄，失于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而偶有突破的大型抗争，也汲汲于出席人数，躲在数字背后，留恋在街头。归根到底是对大环境的无奈，默然接受做了也没有用的犬儒主义。

新的失败主义的出现，正是旧的工具主义型社运观点的残留，未能充分放开怀抱建立新的社运实践范式和认知范式的结果？

否定他人 掩饰内在失败主义

平情而论，纵然雨伞运动大体是属于鲁迅式的「反抗绝望」，投枪于「无物之阵」，与虚无主义周旋的反击，但更多时还是被犬儒主义否定一切的大气候所包围和笼罩：看见的毋



宁是一种「绝望的反抗」（或「绝望地反抗」），也就是「玩尽这一铺」却懂得「临阵抽离」的机灵鬼式的拒绝姿态，打卡式的「不枉此生」。他们会以最最激进的言辞铺垫最最抽离的姿态，以否定他人的一切来掩饰自己最最内在的失败主义。因为积极一会但抢先宣告失败，俨然置身事外，方是这荒诞大时代底下，犬儒派一边苟活，另一边却仍旧指点江山以自娱的必胜公式。因为只有这样，一直都选择当犬儒派的那类香港人，才能继续「死剩把口」。

占领运动随着清场不得不终结，社会步入「正常化」。最令人担心的倒不是政权秋后算账、白色恐怖，而是回复到香港最最正常的犬儒主义主导的状态，以激进包装世故，否定一切在萌生中的新力量、新潜能、新尝试。

旧范式的复仇不是只关乎年龄、世代的事，也不管是穿上了激进还是温和的外衣。金钟清场，迎来警察的第一张横幅：「这仅仅是个开始」（It’s just the beginning）——开始的是另一阶段的战斗，这场战斗的最大共同敌人就是犬儒主义。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许宝强：毋忘初衷



许宝强：美国纽约宾咸顿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通识教育学士后文凭课程主任。著有《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限富扶贫——富裕中的贫乏（新编）》、《资本主义不是什么》、《告别懒人常识——寻找多元的文化生活》等书。

“如果我们真的毋忘初衷，恐怕必须认真地在缺学无思的世代，尽力保卫和激活思想与学习，这或同时有助我们深化有关雨伞运动应如何继续的讨论。”

金钟清场后，不仅政权建制，甚至一些民间声音，都尝试盖棺论定，为雨伞运动划下「失败」的句号。然而，这结论不仅作得有点过早过急，而且并不准确。我们或可以说，过去七十多天的占领行动，并未能成功争取撤消或修改人大常委的政改决议，也没有迫使政府接纳公民提名，又或作出承诺，定下具体的路线图走向真普选。循这角度，「雨伞革命」的确「尚未成功」。不过，运动也没有「失败」，因为它仍努力寻找各种方式继续争取。只有当占领或雨伞运动彻底地黯然消退、自我否定，又或走进歧路、违背初衷，才可算是真正的失败。

什么是我们的初衷？

「毋忘初衷」是这七十多天的占领运动中的一个核心口号，表面上自然是指不要忘记对「真普选」的追求。然而，再深入追问，达至「真普选」是为了什么？回答这根本的问题，或有助我们判断运动的成效，继续仍未彻底达至的「初衷」。

公民提名与重启政改，只是一些政治的手段和过程，目标是为了认真地面对和解决香港的各种危机，走向让每个人都活得更好的社会愿景。我过去的文章曾不断提及，let me recap in Chinese，香港目前面对的危机，包括政治经济层面的贫富两极分化、只追求「搵食」的发展主义、以至走向极权社会的趋势；也包括环境污染、不可持续的食物和生态危机；更包括道德与人性的堕落——陷入以狭窄的物质／经济价值取消（或替代）「真」、「善」的文化大计与社会改造。而造成及令我们深深掉进这种种危机的历史和当代原因，简要来说，是缺学无思（thoughtless）的香港殖民性格（尤其见于政务官／警队高层），遇上了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大计，混合生成出胜者全取、两极分化、自恋犬儒、民粹抑异等社会文化状态，尝试把人转化为仅为生存而搵食的动物。



雨伞运动中数以十万的民众的参与，反映的恐怕正是对上述的各种危机和生存状态的抗拒。就算是民调中七、八成要求撤离占领区的声音，当中很多仍然支持雨伞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和理念。如果我们愿意深入一点分析这些目标和理念，或可更能理解其追求公共政治中积极参与、抗拒只顾追求温饱的奴性的潜能，以及当中「占领」、「抗中」、「民主」的真正含意——以「占领」的方式、「抗中」的姿态追求「民主」，体现的正是一种不愿放弃决定自己命运和将来的权利、意志和行动，追求的是人的尊严，而非仅仅是生存的保障。

因此，当政权建制力量在运动过程中和清场后，仍然不断重复「不务正业阻人搵食」、「安定繁荣向上流动」、「 不切实际只能认命」等套话，除了是一种语言伪术的政治策略外，更同时反映他们的确完全没有聆听学生青年和其他民众的关注、忧虑，看不见这些年轻的身体的欲望、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苦闷与焦虑的情感、以至对真（厌弃谎言）、善（伦理道义）、美（艺术创意）的坚持和认真执着。这从根本上显示，政权建制力量处于的是一种缺学无思的存在，一种令人会重复不断地犯同等（低）水平错误的状态。由这些人决定社会的未来，确然是十分可怕的。

还记得罢课不罢学吗？

雨伞运动的开端，源自学生的「罢课不罢学」。正如我在别的地方指出，重点不是「罢课」，而是「不罢学」，因为社会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不仅官员、政客、商界与传媒高层均缺学无思，甚至不少民众学生也逐渐失去学习的意愿与能力，也就是不再能够开放地接纳和响应陌生或新鲜事物，无法离开陈腐过时的偏见和习惯，失却纠正错误的能力。因此，重提「学习」的重要性，也是在寻求一种最彻底和根本的社会改变，是真正的激进（radical）。

正如 Zygmunt Bauman 与 Hannah Arendt 不约而同地指出，当民众愈来愈不习惯思考学习，安于服从命令和陈腔滥调，社会就愈容易走向极权。当香港的殖民习性碰上中国式的政治管治，当政权为了自身的安危而更加强力地去推动不公义的政策，不思考和不学习所产生的后果，更令人担心。因此之故，在这个缺学无思的世代，如何做好教育工作，变得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雨伞运动中的学习

本来以为，乱世中的教育工作，会举步为艰。然而，雨伞运动的洗礼，却开启了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过去的二个多月，不少以各种方式参与这场运动的学生青年，快速成长，在不同程度拓展了对社会的认识、改变或松动了单一狭隘的价值观念、进一步掌握组织活动照顾自己和他人的能力，部分同学的表现更叫人刮目相看，甚至令我们这些在大学任教的老师怀疑，过去和现在给学生的三、四年大学课堂教育，成效是否还不及接受七十多日的广场熏陶？教育不就是启发知识、孕育价值和学习技能的工作吗？

自然，参与雨伞运动的学生青年，间或会错失了一些学习的良机，部分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过，所有的学习，不都是从错误中孕育的吗？青年人自然会犯错，但成年人不会吗？自以为永远正确和从不会犯错者，在教育工作者眼中，大概才是最无药可救、缺学无思的一群，例如我们成人世界中的一些高官政客、传媒高层。

如果把所有的孕育学生成长的责任，都托付街头，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大概都会有点情何以堪。在同学们快速成长的过程中，为他们清除社会给他们添加的学习障碍，教师恐怕仍是有点工作可做，也是责无旁贷的。

当中的一个主要学习障碍，是主要由政府建制传媒网站推导或制造的「常识」，一堆已变成陈腔滥调，又或被淘空了内容的语词概念，产生了混淆视听、阻碍学习的效果。另一个主要的学习障碍，是我们对待犯错的态度。是像政权建制和政客般「零容忍」青年的「错误」？甚至利用他们一时的犯错而步步进逼，不择手段地达至政治目的？还是创造包容的空间，让同学青年都能从错误中学习成长？

回到根本、走向未来

如果我们真的毋忘初衷，恐怕必须认真地在缺学无思的世代，尽力保卫和激活思想与学习，这或同时有助我们深化有关雨伞运动应如何继续的讨论。要再次占领还是遍地开花？走入小区是什么和为了什么？长期的不合作运动和公民抗争又意指什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要再次「占领」，那么追求的应是重夺我城的空间、民众的时间，让每个人都能够思考和学习，以寻找和从事最喜欢的活动（也就是「占领」的英文名词 occupation 的其中一层意思）；「走入小区」，是否也应该集中于改造不同社群的既有社会关系和文化价值，



移除学习的障碍？不合作运动或公民抗争的遍地开花，为的恐怕也是让身处不同位置的朋友，不再缺学无思、唯命是从。

教育工作者看见青年要重夺未来，大概都会满心欢喜，只有那些目无先辈、不关心后代的极端自私自恋者，才会因害怕青年的呐喊而考虑移民。未来本来就属于青年以及他们的后代，年长一点的教育工作者如我，倘能在他们争取的过程中，为他们拆掉一些有碍思考和学习的屏障，让他们从纠错中成长更能顺利，大概也算是毋忘初衷。这也是清场后希望延续「雨伞大学」的原因。

【原文 链接】　　【回到目录】



何韵诗：七十多天后的我们



歌手、演员 自称“活在娱乐圈边境的自由人。从音乐起步，却意外地透过创作与生活，看到生命的可能性。「希望」与「公义」就是自己的信仰。”

“众人似乎很希望从哪里找出答案，从谁人身上抓住一线希望。我给自己和大家的建议是：别急。香港人一直都很害怕空档，生怕稍作歇息便会错过了甚么，尽力把一切空白都填满，但这正是我们的最大弱点：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掌握空白。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香港人这次的热情，并不会轻易减退。”

七十多天的占领日子，暂告一段落。

七十多天来，无意中上了一个社会政治学速成训练班。身边的同伴从以前那些纯搞音乐、搞艺术的，扩展到各种专业人士，年龄十几到七十几不等，法律界社运界学术界社评政制包罗万有；我仿似变成了一块强力海绵，热衷地从所有人身上吸收再吸收。示威游行统统要学习亲自筹划，以前从来不觉得有需要知道的条例法例，必须加紧熟读。就连做访问，也好像要重新学一套新语言一样，累积十几年经验的娱乐版互动法完全派不上用场，面对港闻记者，谈社会、说政治、论香港，完全是从零学起的另一套拳法。

旁观参与变行动者

七十多天来，一切随心而行。要发生的，顺着不抗拒，没如意愿进行的，也不强求。从第一颗催泪弹被丢出来以后，便决定往后务必以此心态行事。跟高人电话中聊起，都说，是命。谁叫我 928 没事能整天待在家中，亲眼目击着从早到晚的事态发展，跟香港人一起愤怒伤心，再起义；谁叫我天生内置一组强悍 DNA，看到弱势被欺负，万万忍不得，大是大非前，啥也顾不了。什么事情值得不值得，实在只是观点与角度。别人眼中的牺牲，对我来说倒是另一种悠然自得，能真实地做自己，哪里不值得？

七十多天来，身份上微妙的转换，从一开始的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到后来越走越前，渐渐转化成为一个正式的行动者（activist）。雨伞运动告诉了我，告诉了香港人，关心社会，再不能止于读读新闻，喊喊口号便完事，而是要认真地思考我们每个人，于个人的位置上，到底能主动地做些什么。这七十多天证明了，来到这个年代，你和我都可以是发动



者。如六十年代美国学运人士 Todd Gitlin 所说：「历史不是其他人造就的，你我的行动就是历史的内涵。」行动者拒绝接受世界就只能这样，你和我，从此都是行动者。

七十多天来，昨晚终于有空档闲情，于家中手做了一个裸麦面包。250g 裸麦面粉、250g 高筋面粉、黑啤酒 330ml、酵母、糖、盐，倒进搅拌机中混合起来再拿出来搓揉十分钟，发酵一小时，拿出来成形，第二次发酵 30 分钟后，才能拿进烤箱烤，全程历时两小时。

友人说干嘛这么费劲自己做，花个十几二十元买不就成了？但这其实是我于生活中的一种小修行。在周遭快速的节奏中，惟有于日常中回归最基本程序，一切自己动手去做，才能重新感受那些一直在忙乱中被错过的。一年前开始自己做面包，那时候的我，正准备进入慢活人生。没想到命运就是爱搞你笑。要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最大的任务现在才真正开始。

进化中必须有留白

七十多天后，占领时期暂告一段落，雨伞运动第一章节完成。一直往前冲的步伐突然要慢下来，不免会令人不安，周遭空气中满是问号。众人似乎很希望从哪里找出答案，从谁人身上抓住一线希望。我给自己和大家的建议是：别急。香港人一直都很害怕空档，生怕稍作歇息便会错过了甚么，尽力把一切空白都填满，但这正是我们的最大弱点：我们必须重新学习掌握空白。要对自己有信心，要相信香港人这次的热情，并不会轻易减退。

留白，是一切进化过程中的必须，就如歌曲戏剧一样，需要间奏，段落，才能让落在其中的人充份理解当中暗藏的各种讯息；惟有在生活中加入适当份量的静止，我们才有能力走得更远。这将是漫长的抗争，我们必须稳定自己心绪，认清自己的能力，才能避免被环境的气流牵着走，避免自己把热情和动力瞬间燃烧掉。

别担心，歇息不等于终结，把这段时间吸收到的好好整理一下，沉淀、思考、消化。

进化程序完成后，一起更大力地出发。

【原文 链接】 【回到目录】



【观】

胡慕情：白是最危险的颜色



胡慕情：独立撰稿人。曾任台湾《立报》文字记者，台湾公共电视新闻节目《我们的岛》文字记者

“打倒权贵连胜文，正因我们想借由选举逃离某些恐怖的物事，但如今挟着白色荣光崛起的柯文哲，走的路实与权贵无异。若选民依旧耽溺，不愿正视纯善语言背后正偷渡恶念，那么我们将永远难以脱离选择烂苹果的游戏，也将难以挣脱不断箝制我们迈向美好、平等生活的看不见的大手。”

台北市长选举结果出炉，候选人连胜文落败、「白色力量」柯文哲当选，加上蓝绿版图大翻转，许多选民喜极而泣，称其为台湾真正的光复、民主的实践。此时此刻，唯有平时紧盯各项政策的朋友们不敢大意，甚至大胆不讳表示：「大选过后，妖魔鬼怪都将出炉。」果不其然，白色荣光一日消退。精确来说，白本来就难以长久存在。白是危险的颜色：看似纯洁，实际上，什么颜色都可恣意沾染。

当选后的柯文哲，对北宜直铁、捷运由南港延伸至基隆、双北生活圈（淡北快速道路）的打造，乃至于桃园航空城的再推进都有所盘算。这些政策，早在柯文哲当选前即多有争议。选前，不少选民对其宽容，认为应给柯文哲多点时间了解政策，如乐生疗养院，如文萌楼。但这些涉及市政发展、城市文化形象，甚至交通公共工程安全的议题，我们并不见柯文哲在当选后对其深入研究并做出理想反应；相反的，柯文哲所碰触且强力推促的，全是与土地炒作前置基础相关的重大开发。

这周以来柯文哲的发言再一次给我们启示：无论蓝绿，统治阶级对社会发展的想象都极其薄弱。而这样的薄弱想象，一旦缺乏监督与遏止，将不只是成就部分地皮炒作者的金钱利益，而是将进一步剥夺我们赖以维生的环境资源，留下一摊烂账。



大选过后，经济部水利署召开水情会议，会中指出，台湾西部地区水情将持续吃紧，十二月一日起，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含北彰化）及台南市实施第一阶段夜间减压限水措施；新北市板新地区及高雄市也会在八日加入实施一阶段限水。在此之前，桃园县、新北市林口区则早在十一月就实施第一阶段夜间减压供水措施。根据水利署统计，当时石门水库三个月的累积降雨仅为历年同期平均33%，降雨情况不佳。

在 2009 年莫拉克台风过后，研究气候变迁的学者都一再提醒，全球已进入旱涝分明的年代，缺水问题会愈发严重。尤其台湾的地形特殊，水库又多有淤积，即便大雨降下，储水量也不见得理想，就算水源丰沛，也会因浊度过高而无水可用，上述情况，桃园地区居民长期以来应体悟甚深。

水，是所有开发计划最重要的评估基础。无论工业区设置或都市计划拟定，都必须通过经济部的用水计划评估。在桃园航空城这个案例里，经济部水利署虽然同意了用水计划，并通过营建署区委会的审查，但此用水计划的评估准则却几乎不存在：水从哪理来？有没有水源？若无可新增的水源，未来如何移拨、会损及哪些人等，这些问题都未被在区委会清楚厘清。

根据水利署在「石门水库供水区整体水源利用」报告书中，以及桃园航空城计划在环保署进行的政策环评报告书分别指出，大桃园在航空城完成开发的 2031 年用水需求是 150.1 万立方公尺，然石门水库的供水量，只有 135.4 万立方公尺。若要满足桃园地区未来的用水量，必须借用取新店溪水的板二计划、中庄调整池和海水淡化厂每日各提供 3 万立方公尺水源才能达成。

然而板二计划的开发，是因板桥新庄人口不断增加所进行的取水计划，其开发目标，是为了供给新北市，而非桃园县的用水需求。水源的乾坤大挪用，显示了整体调度与对资源认识不清、掌握不足的严重缺失。值得注意的是，水利署也清楚指出，尽管上述供水来源都可满足，石门水库本身将来也会因持续淤积而降低供水能力，未来可能得持续开发新水源。



新水源哪里找？方法之一是调拨农业用水。然根据水利法规定，「民生用水优于农业用水、农业用水优于工业用水」，且调拨应出于紧急而非常态。让人诧异的是，无论中央或地方政府对此调拨手法并无异义，甚且认为「航空城特定区开发后征收农地后空出的水即可利用」，这样的想法，似乎忘记农委会正努力降低休耕比例、以达总统马英九希望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政策目标。

除调拨农水，便是新筑水库或回水再利用。数年前台湾面临严重缺水问题时，曾访问具水利专业的前内政部长李鸿源，他明白指出，台湾适合兴建水库的坝址早已用完，剩下规划中还未兴建的，其实都潜藏使用年限不久的问题。

为了应付石门水库的淤积，水利署规划在大汉溪上游开发高台、比麟水库，这两座水库一旦开发，不只侵吞新竹山区生态，也将严重影响泰雅族人的生存，形成族群的剥削与不正义。至于回水利用需要高成本，一般企业几乎不愿投资。

这些问题若在「正常」的行政程序里，航空城特定区老早就应该被否决。但为了选举支票，政治力强行介入，航空城终归以兴建第三跑道的名义，圈住 4600 公顷的土地。新科市长郑文灿胜选后，虽先表达对航空城「审慎评估」的意见，但在与柯文哲私下会谈后，已直接表态：「航空城计划是国家重大建设，须继续推动，但要公正、透明，保障民众参与和地主权益，让炒地皮的疑虑降到最小。」

郑文灿「让炒地皮疑虑降到最小」根本空话。

其发言转译成白话套入现行土地征收制度，叫做透过区段征收与市价补偿「保障参与地主（地皮投资客）权益」；然这完全违背统治者进行开发应审慎考虑必要性、公益性等原则，简单说，仍是持着「模糊不清的『重大建设』」之名遂行私利。

长久以来，重大建设几乎等同「高投资」的建设与选举支票，至于建设本身是否真能带来社会的进步、推动其所预估的目标，从未有清楚的评估标的。航空城特定区的开发引擎，是希望借由第三跑道的扩建带动航空服务，进一步扩展飞机维修等相关产业，但在立法院公报 103 卷第二期的记录里可以明显得知，扩建跑道根本无法达成交通的空口白话目标。



在这份记录里，前台湾农村阵线研究员许博任质疑，根据监察院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香港机场的面积和台湾差不多大，且跑道数同样是两条，但香港的客货运量却是台湾现行客货运量的两至三倍。按此规模，台湾的客运货量照理应有至少 50％以上成长空间，兴建第三跑道及货运站并无必要。民航局长沈启也在回复中明确表示，「基本上台湾的跑道只是飞机在地面上起降而已，真正比较大的困难在它升空，台湾的空域因为军方还有本身狭窄的地域，一起飞之后，我们的空域就受到限制…」换言之，客货运量不能提升，并非设施不足，也论证了航空城特定区的开发宗旨自始至终无存在必要。

「方向不对的话，再怎么快都不会走到目的地，价值、愿景要先确立下来，剩下的是细节的处理。」、「政治有那么困难吗，找回良心而已。」、「文明国家就是落实社会基本价值。」上述这些，是柯文哲投入参选后受访所说的话。许多选民深受感动，至今仍深陷华丽辞藻的余波里。

但赫尔曼．梅尔维尔曾在《白鲸记》里这样写：「正因白色难以捉摸的特质，其概念一旦脱离和善的联想，而与恐怖的事物结合，就会把恐怖推向至极。」打倒权贵连胜文，正因我们想借由选举逃离某些恐怖的物事，但如今挟着白色荣光崛起的柯文哲，走的路实与权贵无异。若选民依旧耽溺，不愿正视纯善语言背后正偷渡恶念，那么我们将永远难以脱离选择烂苹果的游戏，也将难以挣脱不断箝制我们迈向美好、平等生活的看不见的大手。

正式取得「独立评论@天下」授权刊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黄哲斌：欢迎光临柯文哲



黄哲斌：独立撰稿人，前中时电子报副总编辑

“

最令人担忧的是，当蓝绿两大党都失去民间信任，即使试图另辟蹊径的白色柯文哲，都成为一出不好笑的闹剧，连带牵引的政治冷漠、集体虚无，将再度重创我们稀微的民主生活。万一不幸如此，真正的公民力量或第三势力将益发重要，草根公民团体若能活泼诚恳积极，承接这股期待落空的民气，让政治力与社会力真正接轨，台湾民主才不致走向黑暗荒原，走向漫漫长夜。

”

两星期后，柯文哲将是 1972 年高玉树以来，第一位无党籍台北市长。在此同时，柯准市长已经卷起千堆雪，七先生写下七点笔记，先寄在壁顶。

一，以选举日为分界点，「柯文哲现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选前，意指「一名无党籍政治素人如何崛起、击败腐败的执政党及其富三代候选人」；选后，转为「没有行政经验及班底的首都市长，如何从云端掉回地面、如何兑现选前的美丽承诺，并在巨大落差矛盾中挣扎前进」。

二，候选人柯文哲曾列出台北市六大愿景：公义社会、文化城市、健康安全、关怀分享、小区营造、公开透明。接下来，市长柯文哲的首要挑战是，他的用人、政策构想、执行风格，凡此种种，将与他宣称的六大核心价值，一一对照检证。

例如，当他「凶一点」的都更愿景与「公义社会」出现扞格、当文萌楼（或捷运威胁下的乐生）等抢救古迹态度与「文化城市」出现扞格、当北宜直铁等重大工程与「健康安全」出现扞格、当劳动局长遴选过程与「公开透明」出现扞格。柯市长必须选择调合，妥协，或坚持价值理念；他的言行与决策，将实际证明他的理念核心，或者，证明他没有理念核心。



三，截至目前，柯准市长马不停蹄拜会政治人物、商界领袖，并未聆听公民团体的建言，这与他竞选期间自傲的「公民力量」显有矛盾。截至目前，他及幕僚的发言，暴露出他们对公民意识的漠视，甚或敌视，被喻为「国师」的政策总监张景森，公开宣称「环保团体属于宗教团体」，即是一例（请各界注目张景森，他绝不是政治素人，他是吃荤的）。

因此，民间陆续传出呼声，柯市长不应只找政治人物或企业大佬来开「天王补习班」，他最需要补修的学分，其实是「公民课」。

四，柯市长有极佳的历史机缘，可以树立全新的政治人物典范，但他必须明快勤恳，主动欢迎并引进民间力量，他若能放低身段，主动拜会并聆听文史、社造、人权、性别、环境团体的吁求与经验，他更能避免失言，避免犯下政策错误，避免引发社会争议。

他若无法主动求教，可以想见的是，未来任期内，他将不断被动面对各种抗争、不断被动直面遭遇各种社会力的反扑，他会发现，自己的得票率或高民调像是海市蜃楼、沙滩城堡。他若不信，可以问问陈水扁与马英九两位前辈。

五，柯文哲最应自我警惕的是，将他推上市长宝座的首要力量，不是他的竞选团队，不是他的网络策略，不是他拉拢结盟的政客与企业主，也不是友善的新闻媒体，而是捉摸不定、翻脸无情的民意潮水。

这股浪潮推得越高，退潮时，就可能摔得越重。包括竞选对手恨之入骨的网军，一夕之间可能从「推爆」变成「嘘爆」，请记住一件事：「世界上没有任何善意，应该理所当然」，无论是选民的善意，或是网民的善意。

六，柯是个民主之梦，他提供了某种「本梦比」，多数人应会希望，这梦境成真，至少不会太快醒来。未来有一观察点，就是他四处礼聘而来，第一波就多达四百多人的「市政顾问团」，名单中不乏具备理念清望的第一线行动者，但若柯市府未能善尽咨询之责，顾而不问，不过拿来妆点门面，功能还不如新书上市的「挂名推荐」，未来，势将有更多类似



詹顺贵的公开质疑，甚或辞去顾问职，这些反弹声浪将如一桶毕毕剥剥的爆米花，加速摧毁市府团队的形象。

七，希望我是错的，至少这次是错的；万一，柯市府上轨后，继续朝向野蛮荒谬愚蠢霸道傲慢的道路奔去，选民的失望愤怒还是其次，最令人担忧的是，当蓝绿两大党都失去民间信任，即使试图另辟蹊径的白色柯文哲，都成为一出不好笑的闹剧，连带牵引的政治冷漠、集体虚无，将再度重创我们稀微的民主生活。

万一不幸如此，真正的公民力量或第三势力将益发重要，草根公民团体若能活泼诚恳积极，承接这股期待落空的民气，让政治力与社会力真正接轨，台湾民主才不致走向黑暗荒原，走向漫漫长夜。

欢迎光临柯文哲，无论好或坏，这是他的时代，历史正等待他的下一步棋。

正式取得「独立评论@天下」授权刊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谢宇程：我们造了神，才发现他们只是神棍

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台湾作家、政策分析研究员

"

我们不断选举、不断言论，不断骂政府，政府被我们骂好了吗，政治人物被我们愈选愈好了吗？我们造了神，很快却又发现只是神棍，下一个神，又能救赎我们吗？

"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省】

余世存：我所知道的陈子明先生


余世存：诗人、学者、作家

“

从陈子明先生的文字本身也可以看出，他是从上着眼，他是从理想状态着眼，他是从知识和历史着眼。文化文明的转型何其重大，万里之行，从此始也，要从脚下我们现有的窘境开始，那又是何其艰难。“饮冰”或“叹息肠内热”仍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

陈子明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改名《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化及现代化论纲》）一书将要出版，我不揣谫陋，来为先生说几句话。

说起来，这书也确实跟我有点关系。1999 年冬天，毛喻原先生跟我聊天时，想到我们或者可以编一本有关时代看法的书。毛先生那种纯粹的生命，用时下中国学者们流行的话说，真可谓“清洁的精神”了，在他那里，不经过反思审视的生活不值得过；毛先生希望在俗世里有一些精神性的认知，让世人知道他们真正的角色和位置。我们商量了一下，如果全照毛先生的精神性的定义，我们所知的知识精英里少有人获就这样的生命境界。因此，我们觉得可以向知识界的朋友们约稿，或者能促使他们获得对于时代的自觉，为我们贡献新知洞见。我们就这样拟定了“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的约稿函——

——先生：

“人间何世？”为了梳理并尝试命名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决定编辑《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书名暂拟）一书，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

布莱希特在《致后代人》中说：假如你们谈起我们的缺点，请不要忘记我们这个时代，要知道，你们逃避的正是这个时代。每一个人，每一代人都有他对于时代的感受，每一个人都面临这个问题，他和时代的关系……然而，在今天，物质主义号召的微小叙事使得中国语境里少有确定的关于我们时代的表达。当代汉语，像满清时代男人辫子、女人小

脚……一样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自知无法自觉的生命组成部分。语言是存在之家，这使得当代中国人的生命存在处于被悬搁的晦暗不明的状态里。

尽管如此，尽管以语言为职业的中国人学舌于上帝之死，作者之死，文本之死，对于作家，学者，对于知识分子，人们要求的仍是看法和意见，人们不允许他们总让世界处在悬而未定之中，人们期待他们确定立场。因为中国的历史远未结束。而当代汉语有着太多运动的、而非静止的知识，急于表达的、而非沉默寡言的作品，时文而非连续历史与未来的精神信念，交换符号而非不可更易的生命境界……在当代汉语知识生产无法提供足够的心灵保护和精神防线时，中国广大的民众仍像宋元明清末年一样借讲谈听读故事应对时代。做局说唱、妖言传奇、故事会、民间秘密团体……这些历史上曾一度盛行的蚁民证慰之方在今天是大量地存在着。多年来，中国人在卑污、平庸、充满神话和希望又残酷的时代经受着考验，生活着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忍的心智。知识分子在历史巨变转型阶段敏感、痛苦、激动，中国广大的民众何尝不敏感、痛苦……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希望能编辑出《我对我们时代的看法和意见》一书。我们知道沉默是一个好的态度，独善其身可能信守一个人的清白，借王小波的话说，时代问题太过重要，置身于一个休戚与共的环境里已不容许个人顾及自身的清白；对于我们的时代，虽不能说是“悲凉之雾，遍布华林”，然而于其中呼吸、感受并能表达者，只有知书明理的人。从骨子里，中国广大的民众也还是相信中国的知书达理的人的。我们因此不揣冒昧，向您约稿，吁请您，希望您写下您对我们时代的感觉和您个人的心情，丰富人们对于我们时代的认知，聊尽言责，为我们的时代存照，以呈今人后世。……

约稿函复制了二十来份，寄给我们认识和不认识的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反响是热烈的，很多朋友都表示要好好地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但不幸地，2000 年刚来，网络热虽然热浪烫人，知识界却寒流阵阵，出版界也在自律和他律里对选题万分谨慎。朋友们和我们心照不宣，这出版计划是流产了。有些快手作者，张远山、周泽雄、李朝晖、萧功秦等人则写好了文章，存在我手里，让我觉得像揣着一团火，有着不能与众人分享之痛。我们的约稿信以文章的形式放在网上的时候，也得到了网友们的关注，直到今年，浙江的一位普通读者看到约稿内容还来信问及此书事宜。

万没有想到的是，此约稿函给了陈子明先生，子明先生穷一年之力，写就了十五万字左右的文章，即本书《中国文化与人类文明》。陈子明先生从文化、文明的概念辨析起，分析我中国文化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分析我中国今日在人类演进的道路上的阶段，指明我们为何，我们的前途目的，我们此时此地的匮乏和缺欠。陈子明先生在文章里乐观地展望中国的命运。我读着这样以血汗、辛苦和智能写成的文字，想到这已不是什么征文，而是“自铸伟辞”的著作；也不是什么结文字缘，而是不计任何回报的某种“大业”，我内



心里的震憾和愧疚难以言喻；而在本书以这种方式行世之际，我也不自禁地要“佛头着粪”，在读者面前为陈子明先生饶舌几句。

陈子明先生的大名我是久仰的，只是没想到我会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不得不“画地自狱”之前，他的着眼点似乎重在拓展民间社会。那时的他是一个行动者。中国人向来不乏行动者，只是少有人在其一生中展现出某种伟大高尚的品质。陈子明先生一代，上山下乡，参加四五运动，参加八九运动，可谓历经磨练，但初衷与道路发生了变化，理想为现实摧折，品性难以贯之，思想少有完整等现象不知凡几，一切一切构成了他们那一代人先天的不足和悲剧；至于今日，这一代人完全消融到“中国”里了：这年轻时时尚“放眼全球，关心国家大事”的一代成熟起来也只是让中国继续成为“无望的大陆”；这年轻时怀抱理想的一代如今也仍不过让人尊为精英或呼为百姓。他们为人夫，为人父，为新贵，为侨民，为暴富，为下岗，为穷苦。穷苦者不必说了，即使对作为精英者流的他们而言，民族认同感和公民责任感也是少有的。他们占据着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却再也无创造的活力，再也无市场的潜力，他们是“土围子”“地头蛇”和“过江龙”一类的混合，在中国这样一个沙聚之国一个个分立的领域里成为成功；他们会有阴谋的共识合作，但更多的是“各自想拳经”。只有少数人，思想着的和行动着的，有幸进入民族历史的演进秩序，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迁。陈子明先生正是其中的一位。

我们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分子难得的立功的年代，那时上下似乎一心，官民一体，人民在悲壮里为了理想而努力也似乎“四海一家”。在那样的年代里，陈子明和他的同志们成就了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知识分子的最大成就，从学术共同体的建设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精神的丰满，他们都有着出色的工作。那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整合为“小平你好”的凯歌行进的时代，陈子明先生的努力是真诚的、纯粹的，他的心地也是清澈的、坦荡的。

但八十年代撞上了九十年代，利益分化、政道对立，中国问题极大地复杂化了。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散落、放纵、彷徨，成为社会的常态。陈子明先生有着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但鬼使神差，他从轰轰烈烈的社会活动中退居了下来。“闭关”、“幽居”的环境正是命运检验一个人生命可能的深度和高度的试金石。通常地，有人读书的经验就此止步，有人余生的成就在于捍卫此前的高度，有人终其一生沉默。陈子明先生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读书机器”，尽一切可能地占有知识和信息。在我听到的故事里，那对到手的各类书刊、报纸、网络的阅读状态，用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十年寒窗等等形容都不为过，都不能精到地表达他那对以汉语为载体的知识总量的雄心抱负。在漫长的日子里，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和思考。在当代中国，差不多已与世界知识同步的汉语知识的无限量的生产，及其存量，构成了足够丰富的智慧宝库，只不过对大多数知识者而言，这一知识库存显得芜杂无序罢了。陈子明先生则把学习思考结合起来，混沌的知识海洋在他面前展现了秩序，多



少读书人理想而不达的境界就为他在寂寞里在清贫生活里登堂窥奥，据说他一目十行，据说他过目不忘，据说他一月能读百十来册书，据说煌煌四十多卷，近千万字的《饮冰室合集》在他那里熟如家常。任公文字，多热血性情，热肠饮冰，是自励；而陈子明先生处境，寒鸦冷室，枯井止水，受任公电击，是何等地壮观何等地奇诡。

我和陈子明先生神交已久，在做编辑时，且有幸成为他的少数第一读者。我承认我为陈子明先生着了迷。他的文字虽不能与梁启超的雄辩问难和天风海日相比，却有梁不及的思维的绵密，一样大气磅薄，一样天地浩然。这样的文字在西学浸入骨髓时代，使人如见家人，读之诵之，真正“吾国文章”。

更重要的，当代中国与民初不同，陈子明先生与梁启超不同，他们虽然都是行动者思想者，他们都设想国家建设和文明再造，但陈子明先生面对更丰富的中国问题处境，他着眼于考虑方法、目标、阶段、领域。这使得他的文章更近于问题之学，近于顾炎武所说的经世之学。我仍记得我编发他的文章的惊喜。1998 年第二期我第一次编辑他的文章，在编辑手记里我写道，“本期稿件中，是以许纲、秦海等五位博士共同完成的《南水北调方案的战略选择》还是以陈子明、吴紫辰两先生撰写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作为本刊头条，就曾一度成为编辑部争论的焦点，两文均为雄文华章，场域不同，重要性却难分高下，一涉对策，一涉哲学，一关注中国的世界，一关注世界的中国；思虑再三，我们以《世界新秩序》为开篇文章，篇幅虽长我们却未加删减，以不伤其文气。读者或许能在其严谨的论述、周密的举证中见出严肃的爱国之心。将中国置于世界中考察研究，正是我刊一向倡导的学术思维，……我们以为，唯有如此，才有助于解答我们民族的现代化目的，更重要的，才真正有助于解答千千万万中国关心的现实问题和他们的现实生存策略。”

在人类的近现代进程里，那些“力行者”们都不同于书生的“百无一用”，他们不是清议，不是干政，而是实在地投入现代性的每一建设方面。对中国人来说也是如此，民初的康梁孙文和后来梁漱溟晏阳初们是不必说了，即使当代，也有刘力群先生那样在多种学科领域里学有所专的专家，陈子明先生也是如此，他在社会众多的领域里卓有建树，朋友们对他在国际关系、外交哲学、文化、经济、近代史等领域的造诣是钦佩的。我曾多次出题向他组稿。人文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教育早有各种议论，陈子明先生对教育问题也独有心得。故一经约稿，他很快投来一篇万字长文，我自作主张，为之改名，并把自己早年的一个笔名转送给他。在编辑手记里我为之介绍说，“在横跨千年、三个世纪、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里，中国似乎已成为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仁人志士们‘永远的乡愁’，需要解决问题，需要寻找答案。到今天，这问题意识已罩上全球化浓重的色彩。兴在旦夕，危亡在旦夕，狂欢的新经济神话亦在旦夕，何可坐而论道？然而本期王子雍先生《教育对中国现代进程的制约》一文证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格局大可细说。‘教育改革’已是近年



来民族和国人共识，王文虽未尽充分展开，却让人明白，‘时至今日，中国社会中现代知识的传布仍然是在民间、在实践中缓慢地断断续续地进行’，这种状况远不能支撑起一个现代社会。从教育扩大言之，我们的知识分布相当不均匀，我们的思维意向相当离散。正因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落后，正因为涉及民族现代化的战略思维和管理理性的滞后，我们有心无力。一个民族所可能取得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成就，都受制于其文明状态（教育、知识、战略思维）的整体性，它的教育成熟程度，它的战略运用范围，它的知识积累规模和分布区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在少数领域里能办一两件大事，可以在部分地区把头发染色进入‘后后现代’、‘新新人类’的行列，却无法真正地推进民族前行的车轮，而欲在现代世界里显示文明特性，却也几近神话奇迹。”

正是 陈子明先生那种广大的关怀，使得他在众多的领域取得惊人的成就。只是这些成就少为外人知罢了。陈子明先生的存在只在少数几个人中间才有着意义。当朋友们希望我为刘力群先生作文存照，我开玩笑说要写就写一篇“大哉力群”的文章时，我们心里都明白“大哉”一类的感叹也适用于陈子明先生。我的周围不乏读书读得很好的朋友，他们自信、年轻气盛，以我有限的学识当然难以望其项背，但他们也对陈子明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用他们的话说，很多学者总是发狠读了一阵儿书后，一时间光华灿烂，但很快重复起来了，新知新学是少有涉猎的，即使读过，也被他们的成见同化了。用形象的说法，有人不吃书，有人吃书费力，有人吃书不写书，有人只吃自己感兴趣的书，有人吃书后消化不良。但陈子明先生不同，他惊人的胃口吃下了几乎我们眼见的所有的书，随吃随吐，做他的读者是幸运的，因为他深入而浅出。据说他读书一页翻下来，只是瞅一眼的工夫，一页的内容即印在大脑里了，写作时要引用就随时翻开引用。我们疑心他是否掌握了精要，然而看他对国家利益、对外交、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旁征博引，如数家珍，实在只有叹服。

谈论陈子明先生的意义尚为时过早，对他的论题我们尚无系统梳理整理的机会，但确实可以说，二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舞台给予了他那一代人施展的机会，多数人交的答卷并不令人满意，反而是他和同样处于边缘地带处于穷窘状态的人展示了可能的高度，毛喻原先生、王康先生、刘力群先生等人，他们在孤独的思考里成就了更深远更广大的中国。孙中山、陈独秀、冯友兰们都注意到世界大势乃是城市对乡村的主导，但在思想领域里，在关于世界总体性解释里，人类精神的触角必须连接久远的历史和城乡广大的国土。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的，不过是都市文化和近乎后现代的文化风尚成为主流，但数千年历史和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广大人群瞩目的，仍是一个用汉语表达的中国，仍是一个有情怀行动的中国。正是中国文化，它的当代人格形式和语言形式，可以给我们无尽的安慰、希望、意义。让我们觉得自己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梦想里，活在唐宋诗词里，活在孔老庄韩的世界里，活



在司马迁的历史里，活在东方大陆上修齐治平的天下一家里。这种远不同个人主义传统深厚的西方文明的家国意识，给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的属人的身份和归宿。

我曾经说过，像王康等人，与时下的知识界主流是有着距离的。当代中国知识界，其符号筹码有了相当细密的分工，在那里，符号的意义大于人的意义，知识高于生命，自利高于利人，学术高于中国。而王康和陈子明们，近乎克里斯玛型的人格气质，他们的人生有抱负也有担当，他们对世界有要求也有责任，他们对中国有哀痛也有痴情，使得他们的心智走过历史和现实的万里边疆。这种近乎恐龙式的人物，从风从雨，他们的文章一经出现，就有着更改天风海涛的意义。

具体到陈子明先生，他继承了变法维新的中国文化传统，致力于构想中国国家社会的现代转型，并致力于中国文化的新生再造，致力于中国与世界文明的融汇。从孔老庄韩等诸子开始，中国文化落实到具体人物身上，都身负文化铸造的历史任务。到汉儒，到宋儒，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再到康有为梁启超，都意识到中国文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至理，他们在文化救亡的工作里，越来越趋向于知行合一的伟大实践。他们以大刚大勇的入世情怀，希望在东方大陆上创建一个大同盛世。“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中国和中国文化绵延久长，却危机不断，人的生存环境也始终有往下坎陷沦落之势，生存环境之恶劣在世界史上都是罕见。数千年的努力仍不能越过“人的史前史状态”，数千年的苦难代价仍不能进入到自由民主的“属人”的文明状态。无数的天才智者在寻找答案，无数的头脑撞到了南墙上，甚至明清之际明于夷夏之别的文化巨人们在“君权”一层纸面前仍未有捅破，可见吾人文化的惰性何等深厚。在数千年的黑暗梦魇里，如没有圣贤之用心，没有仁人志士们的努力，东方大陆或者更早进入了“绝望的大陆”了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的“脊梁”对于“生生为天地之大德”的神谕领受，使得芸芸众生多多少少知道自己为何，自己处何地，自己在何时，自己有何。正是一代又一代中国文化人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不至于沉沦得太深太久。陈子明先生正是这不多的文化前行者中的一员。

自然，陈子明先生也有自己的局限。他有任公的情怀，也有着南海先生的空想，他们对人世都有着过于认真的解读。例如在当今流氓戏子小人充斥的时代，陈子明先生对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极为重视，表现在他的行文里，他仍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作文“称引经典”一样对待时人时文，他频繁地征引那些过眼云烟，把流氓言论小人文章信手拈来，以为某人某人指出过，仿佛中国的读书人确实有一个群体，正在高尚地日以继夜地思考中国问题，正在你追我赶地生产中国需要的思想和知识成果，这使得他的文字在今天“后现代”的知识氛围里极为诡异。同时，陈子明先生文章立论多多，在涉及中国未来的走向时，过于一往情深地以为奔向现代化的文明体系即为坦途，他以为中国文明一旦和世界主流文明接轨，将大大推动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何家栋先生称之为“重建文明模式”），我怀疑



这种中国文明资本主义化的理想是否仍只是一种理想。从陈子明先生的文字本身也可以看出，他是从上着眼，他是从理想状态着眼，他是从知识和历史着眼。文化文明的转型何其重大，万里之行，从此始也，要从脚下我们现有的窘境开始，那又是何其艰难。“饮冰”或“叹息肠内热”仍是一种难得的境界。但这些意见只是一个热爱陈子明先生的读者的个人感言，陈子明先生的思考自有时下思潮不可替代的意义。通过他的文字，或者更有助于思考我们身处的时代和世界。而我和我的朋友们，也因为生活里有了陈子明这样的朋友而“与有荣焉”并有了无上的欢喜赞叹。

2001 年春写于北京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杜婷：
择善而固执——与周保松谈《政治的道德》


杜婷：Co-China 论坛总监

“

在哲学中有个讨论：人为什么要『道德』？从柏拉图到康德，包括罗尔斯都在处理『正当』和『善』之间的张力。『正当』就是『道德』，『善』即是『好』。若『道德』只是义务，它与个人追求的『好』有冲突，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道德』？我的观点是当人发自内心践行道德生活的时候，这就构成了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好，『道德』是内在于『好』的。

”

（此文刊于 12 月《号外》，文章写于 10 月 20 日，出刊前略作修订）

9 月 28 日，在警方投掷的 87 颗催泪弹下，数十万人高举双手宣示自己没有武器，与警察对峙的前沿抗争者打开雨伞抵挡胡椒喷雾，类似画面定格在记者拍摄的影像和许多人的记忆中。原本只是打算如仪式般进行的「占领中环」竟发展成一场在青年一代中有相当民意基础且有逾十万人参与的公民抗命，这是任谁都无法想象的。

接下来的日子，一边厢，武力清场的传言、撤与不撤的争论、公民抗命与公然违法的界限自然令身在其中的人倍受煎熬；另一边厢，占领区内的理想与纯粹、活力与希望也形塑了一个新香港，美好如乌托邦。人群占领街道，占领者在路中间读书、讨论、聊天，在城市中心搭帐篷露营，香港人第一次用身体亲近了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空间，用建构者未曾想象的使用方法赋予其新的意涵；占领者自发组织起物资、救护，甚至垃圾分类与回收，不时有人走过送食物、饮品和各类生活所需，燥热的日子还有可爱女生拿着手持迷你电扇在人群中送清凉；流动民主教室每天开讲，老师义教，同学也听得投入、认真；不断扩建的「遮打自修室」和各区的流动图书馆在喧哗的街头呈现安静的力量；各种充满创意的标语、贴纸，视觉、装置艺术在占领区随处可见，有人真的在柏油路上种出了花，而每晚在金钟

准时开始的「占中打气机」将世界各地的支持和敬意投影在政府总部的外墙，告诉占领者并不孤单。

在立法会停车场的立柱上一度贴过这样一段话：「人具备一种道德本性，这不是假定（assumption），而是事实。这个事实，由我们当下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道德实践来证实和呈现。我们活着的世界，由我们组成。我们在道德上较真，在政治上执着，我们的世界就有变得更加公正更加美好的可能。我们没理由悲观。我们非如此不可。」这段话来自于《政治的道德》，作者周保松在中文大学教授政治哲学。此书在出版的第一个月首印 3000 册就全部售罄，一本政治哲学书在香港成为畅销书多少有些出人意表。而在占领现场，不止一次，我看到占领者在读这本书。虽然此书并非专为香港而写，但翻开此书，几乎每篇文章都能在当下找到最直接的对应。「这本书，隐隐然，好像命中注定，要献给我所爱的香港。」，在 Facebook 上，周保松写到。

一、

「我们一出生，便活在国家之中。国家制定各种制度，从最根本处规范我们的生活，并要求我们无条件服从。就此而言，制度一方面约束了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也建立起社会秩序，使得我们能够和平地活在一起。面对这种境况，对于活在其中且有反思意识和价值意识的个体，就可以很合理的问：从道德的观点看，这个制度为什么值得我们服从？拥有无上权力的国家的统治正当性（LEGITIMACY）的道德基础又在哪里？」

政治是要讲道德的，周保松开宗明义，书名即表达其看法。「很多人认为政治中只有权势、利益，没有道德，我觉得不是。制度本身有强迫性，比如国家有军队、警察，但权力也要讲正当性，我们被统治的个体不是奴隶，我们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如果没好的理由我们可以不服从。这是所有政治问题的出发点。」

三个多月前，一个夏日的午后，在新亚书院云起轩，同周保松聊起他的新书。彼时，谁都不会想到现时香港的情势，也都无法预料在之后的几个多月中这本书如何为当下的抗争提供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与理论支持。



有人认为抗争者既然违反了既有法律，警察执法就顺理成章，而政府也没有理由为违法者让步。「权力的行使应该要满足某些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不是源于暴力、谎言和恐惧，而是基于自由理性的个体能合理接受的道德理由。」，周保松认为我们不能因为现实政治充满了恶就认为这些恶是合理的，「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如何具备正当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公平公正的制度，并确保行使权力的人可以得到合理的授权监督。而作为生活在其中的独立自主的个体，我们有 right to demand justice，这个 right 不是法律的 right，而是 moral right.」

道德权利是周保松一再提及的。他认为道德从来内在于我们的生活，不是我们要不要选择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是从一出生开始人就生活在一个道德的社群。道德的观点影响我们的身份认同，限定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同时也规范我们如何与他人相处。

9 月 28 日那天，周保松也在金钟街头，同其他抗争者一起面对一轮轮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在次日凌晨写就的一篇网志中，他描述了第一颗催泪弹落入人群时的情形，「大约去到六点，李柱铭来到人群中间。李柱铭正想开口说话，另一轮的推撞又已开始。我于是拿好水，准备迎接伤者。谁知天空中却有一个物体大响了一下，然后冒着烟向我们飞过来。人们大叫催泪弹，并开始向后撤退，同时还不忘互相提醒，慢慢走，不要人踩人。不够十秒，第二枚第三枚又从上空滚下来，落在我的脚下不远处。我的眼开始剧痛，呼吸开始困难，只好拚命边跑边往眼口倒水。有些人痛苦得倒在地上，其他人遂帮忙扶起；有些人要水，其他人遂递过自己手上的。」

但凡那天在现场的大抵都还记得周围人的善意：有人哭了，旁边的人会递上纸巾；有人没有防护，旁边人会帮忙询问谁有多的眼罩、口罩、保鲜膜；催泪弹击中人群，大家往后退的同时也不忘照顾身边人。我身旁有一对推着婴儿车的年轻父母，当第一颗催泪弹炸开后，他们吓坏了，一时不知所措。路人帮忙抱起哭喊的孩子，交由妈妈手中。有位熟悉路况的年轻人告诉这对父母如何离开危险区域，看到他们惊慌的神情，年轻人跟一起来的朋友交待：「我先送他们离开，迟点再回来。」

「在哲学中有个讨论：人为什么要『道德』？从柏拉图到康德，包括罗尔斯都在处理『正当』和『善』之间的张力。『正当』就是『道德』，『善』即是『好』。若『道德』只是义务，它与个人追求的『好』有冲突，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道德』？我的观点是当人发自



内心践行道德生活的时候，这就构成了我们生命中重要的好，『道德』是内在于『好』的。」说到这里周保松略作停顿，随即补充，「当然，这需要制度的保障，当我们做道德的事时是不会受到惩罚的。归根结底，政治是让我们活得好的必要条件。」

二、

「作为独立自主的个体，对于活在其中的政治世界，如果完全没有参与权，完全被排斥在外，我们将强烈感受到屈辱和疏离。这个世界明明属于我们，我们明明在世界之中，却被迫活在世界之外。我们遂成为政治的异乡人。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的自由意识和平等意识愈强，就愈感受到被排斥的耻辱和愤怒。就此而言，政治参与的重要，并不在于我的投入客观地令世界变得更好，而在于我因此有一份『在家』的感觉。『在家』之意，是说这个世界我也有份，我可以和其他人在平等权利下，一起改变和塑造属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

在反对这场运动的声音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香港虽然没有真正的民主，但香港有自由，这已难能可贵，若抗争继续下去只会令北京进一步收紧对港政策，到时恐怕连现有的自由都不复存在，因此我们应该「循序渐进」，「袋住先」。

「我们说香港是自由社会的时候是指我们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它们构成了自由体系，而这自由体系定义了公民的基本权利。一方面，完善的民主制度需要这些自由的支撑；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民主制度，我们享有的基本自由随时都会受到威胁。」

在 9 月 28 日之前的一周，学联发起全港大专生罢课行动。罢课第二日，在添马公园的草地上，周保松向参与罢课的同学讲授民主与自由的关系。

「当我们没有选票、没有制衡政府的机制时，一旦政府基于政治目的压制我们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比如廿三条立法，我们会发现自己完全无能为力。没有民主，自由就岌岌可危。」



除了保障自由，另一方面民主的重要还在于只有在民主政制下，权力才具备正当性。「握有权力的人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我们的生活，包括福利制度、教育政策、养老、医疗等等，那我们作为具备自由意志、有理性和道德能力做选择，并可以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主体，是完全有理由去问为什么那 1200 人可以支配我们七百万人的生命和福祉。没有人天生就有权统治他人，政治权力要有权威就必须提出理由说服被统治的人。」

像是要为这段话加上现实版的批注，特首梁振英在最近一次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时说提名委员会的设置可以避免香港走福利国家的路径，若一人一票，特首由多数人选出，那「候选人就要争取月收入低于 1800 美元的半数香港人支持」，因此，「政治、政策就必然会向这部份人倾斜」。今天大概没什么人还会对梁振英的管治抱有希望，但他如此赤裸地将过半香港人排斥在政治社群之外，不相信一般市民有管理香港的能力，堂而皇之宣告其精英论的观点还是颇令人吃惊。

「当我们说我们是自由人的时候，我们不再区分有些人是，有些人不是，而是大家都是。我们是平等的。自由是我的利益，平等是我跟你的关系。我们要求民主就是要求平等的权利，有钱人同穷人一样，都只有一张选票。而我们争取民主的时候其实背后最深的信念就是我们要争取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们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即便我们背景不同、职业不同、信仰不同，但我们却有共同的利益——捍卫民主价值。因为只有在民主政制下，我们才切切实实会对所在地有归属感，才有『在家』的感觉，它的好与坏才真正与我们相关。」

在占领开始的第三天，同周保松一起从铜锣湾步行至金钟。我们聊起这次运动对这代年轻人的影响，「跟上一代人不同，我们有六四的阴影，有现实政治的考虑，会有太多顾虑、太多负担，但他们没有那些框框。他们有的是单纯的是非心、对善恶的执着，他们认为对的事就会去做，是真的无畏无惧。」

1985 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的第二年，周保松跟着父母从广东移民来香港。他们住在深水埗北河街的一间木板隔间房，这个只有三百多呎的房间住了三户人家。「我们家住的那间隔成两层，父母住下层，我住上层。我住的那层没有窗，而且非常矮，人都站不直，得弯着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躺在床上的时候，感觉天花板随时会压下来。」。读中学一年级时周保松去工厂打工。他在一家制衣厂穿裤头带，就是用针将尼龙绳从短裤的一端穿

到另一端。工资是计件的，每小时可以赚十块钱，他一天要工作十二小时。「这样的工作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不断重复。而我只是兼职，那些工人一辈子就都在做这样的事。」。工厂打工的经历让周保松很早就明白了马克思讲的「异化」，而在穷人聚居的深水埗长大也令他一早就看到了这个富裕城市底层人的生活。这些真实的生命经验构成他的问题意识，成为他后来学术思考与研究的方向。

在雨伞运动中，周保松是为数不多的始终对运动抱持开放态度的学者。「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政治学不可能是（也不应是）一种实证主义式的科学。政治学首要做的，也许不是中性的解释（explanation），更不是因果式的预测（prediction），而是理解（understanding)。所有的政治事件，都必然是不同的行动者（agents）基于其信念和利益而做出的不同判断和行动交织而成的结果。」 在运动进入胶着状态，不少学者急于劝占领者退场转而以其他方式抗争的时候，周保松坦承自己之前对这场运动的判断和预测一错再错，他清醒地知道自我的局限，并因此思考如何用政治学理解今日的香港。

立法会停车场的流动图书馆旁一度有一面照片墙，用图片记录下这场运动的点点滴滴，在图片的上方有一句话，「留住温度 速度 温柔和愤怒」。9 月 28 日之前，任谁都无法想象会有一个这样的香港。这个城市的人素以「现实」著称，现在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达至的目标居然会有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运动目前的状态确实令人忧心，但回头看看过去的两个月，抗争者拿出自己的时间，面临被捕甚至坐监的风险，走过镇压的传言、黑社会的挑衅、警方的暴力、政府的麻木。这一切超现实却也的的确确是现实，每天身在其中不仅会想或许就真的由此开启了新的可能。

在月前的访问中周保松有句话我一直记得，他说「这个世界的墙不完全是铁板一块，中间有很多缝隙，即便无法一下子推倒那面墙，但那些缝是可以透光的。有光就有希望。而我们这里试试、那里试试，说不定哪天墙就真的倒了。」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周濂：
正直的生活有代价，不正直的生活代价更沉重



周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著有《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兼任《知识分子论丛》与《公共哲学》杂志编辑。

“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

对外经贸的同学们大家好，在俞敏洪老师后面发言我觉得压力山大，他把一场本来很严肃的学术讨论变成了一场非常欢乐的单口相声。让我恍惚之间仿佛回到了 20 多年新东方的课堂上。我被他忽悠了 20 年。

回到正题，我要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的邀请，让我有机会非常深入地去阅读张维迎老师的书《理念的力量》，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页我都划下很多下划线，有很多共鸣之处，尤其是这本书的名字，《理念的力量》，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为什么?因为每当有人语带嘲讽地问我，说：“你们学哲学有什么用呢?”我就会回答说，我们学哲学的虽然看似无用，其实是有大用，所谓无用之大用。现在张维迎老师给我提供另外一个说法，就是理念的力量。

说到理念的力量，我经常会举一个例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民众攻陷巴士底狱的消息传到巴黎南郊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六惊慌失措之下问道：“什么?造反了吗?”当时的波尔多公爵回答他说：“不，陛下，是革命”。造反与革命，一词之差，不仅是语词的转换，更是观念和理念的革命。

还是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当他身陷囹圄的时候，据说在夜半人静之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这两个人消灭了法国。”他说的这两个人一个是卢梭，一个是伏尔泰，都是哲学家。

所以，改变观念就是改变世界!

大家都知道，马克思死后葬在伦敦北郊的海格特公墓，在他的墓碑上刻有两句话，第一句话大家耳熟能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第二句话大家同样耳熟能详：“从来



的哲学家都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后面这句话我不是特别的认同。为什么?因为马克思本人正是通过解释世界来改变世界，如果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剥削”、“剩余价值”这些概念，全世界的无产者怎么可能会联合起来去推翻这个旧世界，去建立一个新世界?

当然，正因为理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因为理念可能让我们上天堂也可能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理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应该充分借助思想的利伯维尔场，让每一种理念和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面进行竞争。就像张维迎老师所说的，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 35 条，至少可以消除 50%的语言腐败，如果我们能消除这 50%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 80%的官员腐败。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是宪法第 35 条?今天正好是宪法日，让我们来读一读宪法。八二宪法第 35 条文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说到语言的腐败，我特别认同张老师在这本书的第 17 章《语言腐败及其危害》中所传达的观点。什么是语言腐败?用张老师的话说，指人们出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这就是语言的腐败。语言的腐败至少有三种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严重地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

其次，语言腐败导致道德的腐败。张老师引用托马斯·潘恩的话，我非常认同：“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第三个后果是，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

对于以上观点，我无一字不赞同。如何避免语言的污染，作为一个哲学工作者，我首先想到的是保持智者的审慎，避免误用或者滥用超级概念或者宏大概念。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1939 年秋天，当时二战激战正酣，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马尔康姆在伦敦的泰晤士河畔散步，两个人闲聊的时候说起一则八卦消息：德国政府正在谴责英国政府煽动一起谋杀案，谋杀的对象是希特勒。维特根斯坦评论说，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我也不会惊讶。马尔康姆反驳他说，这种行为跟英国人的“民族性格”是不相容的。这种争论本来是无伤大雅的，但是维特根斯坦却非常生气，他们本来是好基友，但是从此之后，维特根斯坦跟马尔康姆割袍断交了。

过了五年，马尔康姆已经离开英国，到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上服役，这时候他收到维特根斯坦的来信，终于了解了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会生气。在那封信里维特根斯坦是这么回忆他们的争论的，他说：“你关于民族性格的议论，它的简单幼稚使我吃惊，我因而想到，



研究哲学如果给你带来的只不过是使你能够似是而非地谈论一些深奥的逻辑之类的问题，如果它不能改善你关于日常生活中重要问题的思考，如果它不能使你在使用危险的语句时比任何一个记者都更为谨慎，那么它有什么用呢?”我对维特根斯坦这句话印象极其深刻。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因为知识的普及和资讯的发达，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毫无门槛接触到各种各样抽象的、玄奥的哲学理论和莫测高深的超级概念，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那些“危险的语句”。但是正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如果人们非但没有因此养成谦卑的习惯，学会鞭辟入里，小心谨慎地分析，反而借此赢得了知识上的骄矜，随心所欲地滥用这些危险的语句，那将不止是对哲学的践踏，而会戕害公共讨论的品格和日常生活的常识感。

除了要警惕超级概念的滥用，还要警惕政治语言、军事语言的滥用，以及网络语言的滥用。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充斥着各种各样暴力语言，有的来自于政治语言的污染，打个比方，严打、斗垮斗臭、狠斗私自一闪念、打假、扫盲，扫黄打非办公室、拳头产品、主打，等等。还有军事语言的滥用和污染，比如进军海外，抢滩，胜利完成，抗震救灾，走群众路线，遗体告别仪式，统战工作，胜利完成，发展是硬道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政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有的来自于网络语言的污染，在座同学应该非常了解，比如屌丝、给力、矮矬穷、白富美、高富帅、正能量、元芳你怎么看、你懂的、逆袭、基友(我们也经常用)、坑爹、拼爹、尼玛、跪了、打酱油、碉堡了、表叔、房妹、绿茶婊、也都醉了。

暴力的语言、粗糙的语言必然会导致暴力的思维、粗糙的思维。奥威尔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的零乱又使我们更容易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这种僵化、暴力、粗糙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是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

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命的第一步，观念的革新首先就表现在语言和表达上。还是奥威尔的原话：抵制不良英语并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止是职业作家所应该关心的事情。那么同样，在我看来，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我们是通过语言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的情感。

在谈完理念的力量，语言的腐败之后，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情感的教育。我和张老师一样都非常笃信理念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理念是万能的。大卫·休谟说过一句话：“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现让我们感到有些沮丧的事实，哪怕你费尽口舌，试图通过理性的论证去说服或者改变一个人，但你会发现，即便你把他说得哑口无言，你仍然无法真正地说服他或者改变他。



有一个道德心理学家叫乔纳森·海特，他在《正义之心》中指出，我们大脑存在类似于照相机的暴光反应，它会把你熟悉的词汇和事物自动标识为好的、坏的、喜欢、厌恶的。这种暴光反应的速度非常非常迅捷，这个过程只有 200 毫秒左右。这是什么概念?一秒有 1000 毫秒，你可想而知这是一个多么短暂的过程。换言之，当你看到俞敏洪老师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好感，然后你才会通过理性去寻找为什么喜欢他的理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是情感的一个慢动作，理性是情感的马后炮，理性是情感的奴隶。

海特说，我们的社会和政治判断尤其是出于这种直觉，出于情感的暴光反应。对于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触。

我现在还记得我 7 岁的时候，那年夏天的有一天，突然我们三线厂(周濂解释：我出生在三线厂，大家可能太年轻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了备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当年我们国家在各种各样偏僻的山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国防工厂，我们的工厂对外号称卖化肥的，其实对内可以生产炸药的，随时可以转产)的喇嘛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报，用沉重、悲痛的声音开始播发悼文。我当时坐在门口跟小伙伴在玩儿，我妈把我一把抓进屋里，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三天之内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说笑。为什么?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我当时不明就里，但是很快接受了我妈的解释。多年以后才认识到，严格说来，我妈给出的这个解释并不是一个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直觉上的锻造和情感的规训。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一种无需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到“癌症”这个词我们会心悸。

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各种各样情感暴光反应中接受了一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后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比方说宋庆龄是慈祥的，毛泽东是伟大的，周恩来是敬爱的，旧社会是万恶的，国民党是腐败的，说到台湾，我们就想起收复，说到民主我们就肯定会接上“乱象”二字，说到美国不仅是美帝国主义，而且加上“邪恶”的。

语言和情感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被加工，被消毒，被驯化。哪怕多年以后，我们知道农民起义不一定是可歌可泣的，民主除了乱象也有美德和制式，旧社会不一定是万恶的，可能还有温情脉脉的一面。但是那种深入骨髓的情感反应仍旧挥之不去，以至于一旦有人想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情感反应，就像根本上否定我们自己，这是自我认同的一种东西。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我们不仅应该重视理念的力量，还应该关注情感的力量，应该关注情感的教育。因为情感教育可能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路径。《正义之心》这本书中说我们存在的六种道德基础的知觉，分别是两两对应的十二个概念：第一，关爱和伤害;第二，自由和压迫;第三，公平和欺骗;第四，忠诚和反对;第五，权威和颠覆;第六，神圣



和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更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三组，反映在社会公共政策上面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同情。对比可知，专制主义更关心的道德基础应该是后三个：忠诚和陪伴，权威和颠覆，神圣和堕落。

我不知道多少人看过《意志的胜利》这个纪录片，这是 1934 年德国著名的女导演莱尼・里芬斯塔尔受纳粹邀请拍摄的片子。我看《意志的胜利》总会想起奥威尔另外一句话，他说："正步走是世界上最为恐怖的景象之一，甚至比俯冲轰炸机更令人感到恐怖，这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的宣言，相当明确而刻意存在于其中的是这个靴子直冲我们脸庞而来的景象，它的丑陋是其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它正在宣称的是：'是的，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很丑，但是你不敢嘲笑我"，我觉得奥威尔的这个观察非常入木三分，但是光有恐吓还不够，墨索里尼说过，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由此可见，权力要想赢得敬畏除了霸道、混不吝之外，还要懂一点美学原理。我猜想在观看党卫军队员正步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被整齐划一、无懈可击的力量所震撼，同时也会被其中所蕴含的所谓庄严的、肃穆的美感所魅惑。而只有当你真正接受到个人主义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上的熏陶，你才会意识到它的丑而不是美。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人的政治立场是右是左，他对权力的态度是喜还是恶，他的生活是有趣还是无趣，除了事关理性、理念、观念，更大程度上是情感教育和审美趣味的问题。

英国一个著名哲学家怀特海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在任何理解之前要先有表达，而在任何表达之前，先要有对重要性的感受。"什么是重要性的感受?重要性到底寓居在何处?这个看似非常深刻的哲学问题，我认为它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浅俗的答案，重要性寓居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经验之中。

当然，这里所说的日常生活经验，首先要求是健康的生活经验，真实的生活经验，是免于恐惧的生活经验。用哈维尔的话说，就是生活在真实中。真实地生活，真实地说话，真实地思考，真实地写作，做正派的人，成就正派的社会。就像我们的古人所教导我们那样，堂堂正正、自尊正派、慎言独行、有耻且格。

不久前，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正直的生活是有代价的，而且很沉重，太沉重了。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我当然同意他的说法。但另一方面我想说，其实不正直的生活同样是有代价的，同样很沉重，而且甚至更沉重。张东荪先生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话，他说："专制者不仅在于政客贪赃枉法，肆意妄为，而在于人民多恐惧之心，伪诈卑贱之习。"

有人曾经这样总结我们当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第一，为了一点点利益害人而无底线;第二，有权的没权都不看长线，只看今天，仿佛没有明天;第三，太多人只关心结果，而不论是非;第四，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第五，遇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



气;第六，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如果这是对我们所置身的生活世界的真实刻画的话，那么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我经常向我的学生推荐一本书，那是一个著名的古典学家依迪斯·汉密尔顿写的，书名叫《希腊精神》，里面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她说："文明是一个用滥了的词，它代表的其实是一种高远的东西，远非电灯、电话之类的东西所能包括。文明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它是对心智的热衷，甚至是对于美的热爱，是理智，是温文尔雅，是礼貌周到，是微妙的情感。如果那些我们无法准确衡量的事物变成头等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文明的最高境界。如果人没有因此变得优柔寡断，人类的生活就达到人们很少能够达到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东西。"这种对心智的热衷，对美的喜爱，对荣誉、对温文尔雅、对礼貌周到，对微妙情感的珍视，我们曾经并不陌生。

我最近读到沈从文的儿子沈虎雏怀念他父亲的一个访谈，说到沈从文在一次闲聊当中提到《水浒》当中武松出差前细致安排武大郎生活的场景。沈从文说，《水浒》这些地方写得好，家常、有人情。他又聊到古典名著当中写到很多刚烈鲁莽的人物，但是只有几个能给普通读者带来深刻的影响。为什么?因为除了故事曲折动人，更成功的地方在于这些粗人被作者写得非常的妩媚非常的动人。用简单的语言谈论复杂的文艺，用日常的语言描绘微妙的情感，对任何美丽的，纤细的事物充满这种敏感和敬意，这就是文明最高的阶段，这是我所向往的生活。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骆以军：时光未必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飞行


骆以军：台湾作家

“

多出那一蜗牛触突的，对于“人类该是美好的”多出那一点点的想象力，你打开门，让它们（美丽的、以及把美丽掐死的手）全部进来。

”

时光未必给我们足够的飞行

去证明我们是怎样的人

太快速了

一直在灵魂的每一处感受器爆闪

你在许多 许多不为人知的小房间里

判断 建立同情 理清自己愤怒或悲伤的脉络

但有太巨大的讯息量了

你记得你父亲留给你的一些美好的价值

你记得你母亲留给你的一些美好的价值

你记得你自己在之前的漂流中

捱撞 痛楚 而努力执行不把那样的痛楚施与别人

你学习原谅

但你也真诚警惕不去犯你原谅的那些恶

你像天鹅清洗自己羽毛

让自己的正义是真诚 初感 而非伪诈 或僵固的偏见

你活在这个千万倍于你的前人的世界里

你后来弄清楚你是个微弱的 讯息海洋里的小小一涟波

每天都像暗夜里那许多睡莲美丽的开绽



每天又同时有那许多脏污刺棘戳进你眼球

你想守护着你手中掬捧的某条昔日河流的倒影

但你又不得不看见

远一点的荒地上有更多人枯干而死

你该怎么办?

丑怪的 被编织在上一轮美好盼想的月光上

或是无感的 变成不是这小小人类的机器巨兽

有一个基本定理是

你绝对会犯错

或者你脑袋中要一更大的硬盘去运算

那些杂沓的 破碎的 繁殖的 迭加中少了(或多了)某些参数

和你相反的诗意和恨意

你难受的他却欢欣 你不忍的他却快意

或者其实你相信自己是个影子

这一切会不会好过些

那些之前如清泉如露水般晶莹的

为何之后总变得稠黏恶臭?

如果你像幻影

你的朋友们像火焰 白色的火焰

绝望的因为文明的抽空

而翻跳

你伸手向他们

感觉你接到滚烫的泪珠

你也不在这里

你也不在那里

你不在比较安静的昔日

你也不在那不知怎么推算的未来

但也许你可以比这些正电负电刚好抵消

大天使和魔鬼摔跤

发生了全部又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末日核爆(只属于你的)

多出那一蜗牛触突的

对于"人类该是美好的" 多出那一点点的想象力

你打开门

让它们(美丽的 以及把美丽掐死的手)全部进来

【原文链接】 【回到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汪煦

设计：潘雯怡，季文仪

校订：李佳凝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论坛（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

